



三个村的 四十年

——乡土中国社会变迁调查

主 编：王卫民

副主编：卢晖临 彭涛

国文史出版社

国务院参事室资助课题

三个村的 四十年

乡土中国社会变迁调查

主 编：王卫民

副主编：卢晖临 彭涛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个村的四十年：乡土中国社会变迁调查 / 王卫民主编.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11

ISBN 978 - 7 - 5205 - 0766 - 0

I . ①三… II . ①王… III . ①农村经济发展 - 调查研究 - 中国
IV . ①F3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8068 号

责任编辑：秦千里 窦忠如

装帧设计：敬德永业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100142

电 话：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010 - 81136655

印 装：北京市朝阳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89 × 1194 1/16

印 张：18.25

字 数：186 千字

版 次：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责任编辑：秦千里 窦忠如

封面设计：张 军

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宁夏固原市河东村各队位置



安徽凤台县店集村地理位置



浙江温州市珠岙村地理位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实践团在温州珠岙村文化礼堂合影，2016 年 7 月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在淮南店集村合影，2018 年 1 月



北京大学调研学生在淮南店集村整理访谈资料，2018 年 1 月



北京大学师生在固原河东村村民家中召开妇女小型座谈会，2016 年 7 月



北京大学学生在固原河东村调研，2016年7月



在北京召开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跟踪研究课题研讨会，2015年12月

序一 • 王卫民

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时期。数亿人口迁徙流动，工业化、城镇化步伐急剧加快，传统的乡土社会悄然瓦解，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近百年以来的图变图强，从改革开放开始步入了快车道。

这一切变化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最核心的内容是松绑赋权，赋予劳动者自主经营的权利、自由迁徙的权利。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精耕细作，精心安排作物结构，短时间内解决了吃饭问题。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成为中国工业化的最重要推手，“无限供给”的劳动力造就了“世界工厂”。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追求最大的梦想：做个城里人！城镇化因此如火如荼。松绑赋权、告别短缺、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这是四十年快速发展的基本脉络，其主战场在农村。

要描绘中国社会四十年快速变迁的画卷，必须从农村入手。

20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师从费孝通先生攻读社会学研究生，其时费先生以其早期著作《江村经济》著称于国际社会学人类学界。费先生认为，当代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变迁最为剧烈的社会，是社会学者最好的研究样本，希望学生们能写出新的“江村经济”。我毕业后一直在机关工

作，终日忙于行政事务和官样文章，离先生的要求越来越远，但先生的教导一直未敢忘记，对社会变迁的观察和记录一直没有停顿。

本书记录的三个村庄，与我都有深厚的联系。

宁夏固原市彭堡乡河东村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童年的记忆主要是短缺和饥饿。记忆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件是，一个同伴因为饥饿难耐，饱食了生产队喂牲口的油渣，腹胀而亡。另外一件，那时候乡村非常封闭寂寥，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没有一丝生气，偶尔有邮递员的摩托车或公社的拖拉机路过，孩子们争相追看，有一次一个同学由于追得太紧，衣服又太破烂，被卷进拖拉机的链轨，碾压成一团血肉。那时候乡亲们最大的理想就是想吃多少吃多少，想吃什么吃什么。现在回到村庄，吃自然不在话下，四通八达的硬化路，随处可见的小汽车，令人感慨不已。这个西海固的普通村庄，已经换了人间。这是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最好注脚。

1985年，我在大学读书期间，到浙江温州市永嘉县江北乡做社会调查实习，结识了同龄的副乡长陈志斌同志。志斌好文喜墨，与我们自然亲近，此后几十年间，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一直在永嘉县从事党政领导工作，在后来的工作中，我们有机会或在北京、或在永嘉，经常一起谈论关注永嘉、江北的发展变化。每到永嘉，我总要到曾经住过一段时间的珠岙村看看，见证了这个村由稻田蛙声到机器轰鸣的蜕变。

2010年我到安徽淮南市挂职工作，选取凤台县店集村作为调研联系点，每到节假日，只身一人的我常到店集村居住，做了一些深入调查，交了很多农民朋友。店集的最大特点是绝大多数劳动力都在外务工，主要是长三角地区。因为务工，村里人吃上了饱饭，娶上了媳妇，买了轿车，住进了洋楼。也因为外出务工，不少人有了不光彩的犯罪记录。从店集，我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看到了发展的代价，体味到农民改变命运的悲壮和凄凉。店集的故事，充满了农民的智慧、勤劳、勇敢，演绎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命运的大起大落。四十年改革开放，由无数个店集村扮演主角，四十年改变了这些村庄沿袭数千年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些村庄也造就了当代中国的发展繁荣。

这三个村分别位于我国东、中、西部，发展也呈现出梯度的特征，从不同的原点出发，今天的发展水平也不相同，但走过相似的路，经历了相

同的发展变化。从社会学“代际变迁”的角度讲，最落后的河东村变化最大。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更公平、更均衡，三个村的案例说明，改革开放前的公平只是体现在大家都穷，但城里人和乡下人、富地方和穷地方，其社会地位、生活水平差异更大，更不均衡。

2010年我在安徽工作期间，曾经萌发写一部《三个村的三十年》，但做起来觉得仅凭一己之力难度太大。2014年底，国务院参事室设立了中国社会变迁课题组，联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展三个村的跟踪研究。一方面开展学术意义上的社会变迁研究，另一方面根据政府的中心工作选取几个专题，开展对策研究。这个课题一直延续下来，至今已有4年，积累了上百万字的一手材料，也取得了预期中的学术研究和建言献策成果。

中国社会这四十年的变迁是一幅浩大的画卷，三个村的四十年只是画卷的一角。期望本书对记忆改革开放历史，认识改革开放意义，总结改革开放经验，进而坚定改革开放道路能有些许贡献。

2018年11月

序二^① 卢晖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从2014年底开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承接了国务院参事室“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跟踪研究”这个课题，作为课题负责人，我想先向大家汇报课题的目的和研究内容。

课题最初设计的时候，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努力了解中国改革变迁的微观历史，试图通过三个中国农村社区变迁历史的记录，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王卫民副主任讲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乡土中国变身城市中国，确实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过去这三十多年的中国巨变，发端于农村，从农村那里获得持久的推动力，并反过来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对于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已经有很多人做出了自上而下的历史书写，但是立足基层农村，以扎实的田野资料，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做出的观察和思考并不多见。

第二个目的，是近距离观察农民生活和农村社会变化，及时捕捉农村的新问题和新动向，为国家出台农村政策提供建立在第一手材料上的咨询意见。如果说过去三十年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依赖的主要是摸着石头过

① 本文为2015年在课题研讨会上的汇报发言。

河的权宜之计和实践智慧的话，未来三十年，中国将进入一个方向选择和策略定型的时期。国家层面制定的任何政策，都将产生长远的影响。定型期的政策制定，不能再依赖权宜之计和实践智慧，而应当建立在对城乡社会历史和现实审慎调研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分析既往政策的实践效果，辨析过去和现在的联系，通过过去预判未来的发展趋势，及时调整既有政策和制定新政策，以对定型期的政府政策、方向和结果，有着更为系统的引导和掌握。

从学术的角度，我们还希望做到社区研究和制度分析的结合，这是我们的第三个目的。大家知道，社区研究和制度分析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趋势，制度分析开始兴起，社区研究开始衰弱。但是实际上，这么多年，制度分析的发展和一些共识，正在呼唤社区研究。传统的制度分析，特别强调制度的限制性作用，即制度作为一种规则、框架，对于农民、地方政府等各个行动者的限制。但是对于这些行动者的选择，行动者根据自己的处境、根据自己的利益如何主动灵活地运用制度，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去变更制度，这方面的关注是不够的。所以在这种情境下，近年来，新制度主义社会学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作“限制中的选择”，就充分认识到了行动者选择对于制度的重要作用。那么，怎么去捕捉这种行动者选择，这种微妙、精细的内容，我认为社区研究就提供了非常好的途径。这是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来说。从社区研究角度来说，我们今天做社区研究，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回到 20 世纪 30 年代费孝通先生的做法。那个时代的社区，是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存在。现在，村庄虽然有边界，但是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文化力量穿透到社区，影响每一个农户、每一个人。所以今天，从社区研究的角度，我们呼唤制度分析。我们希望打通社区研究和制度分析的区隔。

课题关注的主要问题有四个方面：

第一，是农业生产方式的问题。农村经历改革之后，从过去的集体化生产走向小农生产方式，三十年过去，中国农村农业可以说又到了十字路口：我们中国是否可以像欧美一样走大规模城市化的道路；农村问题的解决是否就是农民的终结；土地流转制度和规模经营，能否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生产者联合是否应该立即提上日程；农民合作的条件和障

碍是什么。

第二，是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问题。这也是农民研究、农村研究一个传统的议题，我们关注土地可以为农民提供什么样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农民目前是什么样的收入和消费结构；衣食住行等生活消费自给程度有多高；城乡路网、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给农村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农村是否可以成为年轻农民工的避风港和归宿；等等。

第三，是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问题。比如说农村公共服务提供的主体，是依靠行政组织还是交给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农村自身的作用如何体现；如何发挥乡规民约等通常被称作社会资本的因素的作用。

第四，是社会治理和乡村秩序问题。关注的具体问题有，当前农村社会矛盾存在的根源；地方政府和村委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民间还有什么样的化解矛盾的机制；民间组织的现状和作用；等等。

大家都知道我们过去做政策研究也好，学术研究也好，很多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研究，或者是针对专题的研究。但是这个课题是在全国东中西部各选取了一个村庄，对三个村庄做持续性的跟踪。这也是我们社会学界最杰出的代表，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江村经济》的研究方式。这种方式的社区研究与流动性的研究相比，它的好处是能够提供长期跟踪观察前后比较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可以显示出社区研究的优势，我把它叫作整体主义的信念。它强调社区中的经济、政治、技术、法律、宗教等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复合体，对于任何一个方面的深入理解，都只有放在总体的社区情境中，在与其他方面的关系中才能够达到。这一点，在结构主义大家列维-斯特劳斯，以及费老的作品中都有体现。我们不能单独就某一个现象研究某一个现象，必须把它放在某一个情境中去。而对于农村来说，乡村社会、村庄就是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载体。

具体到课题，我们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撰写村史。为什么要做村史？我认为，村史对于我们了解这三个村庄的任何一个现实问题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譬如你今天去这三个村庄看看，地处东部的珠岙村童装业非常发达，但是我们不会仅从企业结构、技术水平和市场网络去研究它的童装业，而是首先去了解更复杂更多元的村庄历史。村史怎么写？我们倡导一种动态、多层次和多主体的写法。目前，放在大家面前的，是我们第一年努力的结

果，它不是一个最终的版本，在第二年，我们将做更多更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将对不同层面和不同主体的研究都放进去。这些村史我们可以交给我们的村干部，我们的村民，让他们提意见，我们再去吸收大家的意见，去理解村庄里发生的事情。

关于课题就介绍到这里。今天，我报告的题目是“从遗弃的空间到希望的空间”，是对于三村初步研究后的一个不成熟的思考。

我们研究的重点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变化。如果我们看这三个村庄的变迁起点，就会发现，它们和当时全国绝大多数村庄一样，都是“三位一体”的空间。三位一体，即生产、生活、社会交往高度重合，是传统村庄的一大特点。农民在村庄进行农业生产，也居住生活在村庄，并在这里很自然地展开社会交往，发展社会关系。新中国的农业集体化将小农生产方式改造为集体农业的生产方式，却没有改变村庄三位一体的空间格局，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强化了这一特点。农村改革是三位一体空间开始分化的开端。农村改革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大量潜在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随着80年代城市的工业化发展，大量农民走出村庄，进入到矿山、工地，进入到矿区、城市。我们首先看到农民生产空间的外移。第一步是农民走出村庄，在村庄之外寻找生计。中国农村从糊口转变为温饱，农民生产空间的外移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当时把几亿农民圈在农村，在这种体制下，农民是很难实现温饱的。虽然今天的永嘉发展得最好，但80年代之前，永嘉仍然是一个糊口经济的水平。这样一个生产空间的转移在农民工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我们经常讲的布罗威的概念，“拆分型劳动力生产模式”。今天2.7亿的农民工，1.7亿左右的进城农民工，他们的生产空间彻底地转移到了城市，但是，他们的生活空间和社会交往空间只是部分转移到了城市。他们在城市里打工生产，但养育下一代、成立家庭、后代的抚养和教育等主要还得依靠故乡。他们一年中在乡村里待的时间很短暂，一个月左右甚至不到，但这短短的逗留，这期间亲朋好友的聚会，对于他们来说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

从这三个村庄的经验材料来看，我们未来农民的发展和归宿，可能有不同的方向 and 选择。在一些经济学家那里，解决农村问题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消灭”农民，即把农民转化为工人和市民。在这种思路之下，乡

村成为遗弃的空间，在一些经济学家那里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但是我觉得这种思路是天真的，基于中国的人口、资源和历史等，哪怕中国未来30年城镇化的水平达到70%，我们还有30%，即五亿左右的人口还是农民，依然生活在几百万个自然村里，所以我们当然要思考农民的出路，思考村庄的出路。具体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如何在空间分裂之后，开启新的整合。

先说东庄湾（河东）。在东庄湾，大量青年农民离开村庄，他们中大多数不会回到村庄，其中一些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在务工的城市安家，村庄成为中老年人留守的空间。东庄湾地处西海固贫困地区，其“空心村”的特点在东部和中部的农村中也非常典型。对于这类村庄，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让它成为留守农民的家园？做不好就是弃地，做得好就是家园。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是大力推进进城农民工市民化建设。过去几年我做农民工研究，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是，对于在城市有稳定工作和长久生计的农民工，要加快其市民化进程。很多人会认为，年轻人外出是对农村的抽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人口的流出也会缓解人地之间的紧张关系。

其次是重建乡土。其中的第一要务仍然是扶助生产，巩固小农经济基础。出席今天会议的，有来自东庄湾（河东）的钱大爷两口子，他们年过60，已经完全退出了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但是他们种植了二三十亩地，还养了几头牛，正常情况下一年有三四万元收入，能维持有尊严的生活。我们的政府应该让他们更好更轻松地进行生产，提供技术和制度上的支持，比如在农业科技供给和农产品收购等各个环节提供支持。随着年龄增长，像钱大爷这样的老人劳动能力会逐渐下降，但只要针对小农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够配套，他们可以维持很长的劳动周期。第二要务是生活设施和村庄环境的适度改善，为中老年人生活在村庄提供便利，包括水、电、路等设施的改善。第三要务是社区公共活动的兴办。我们很难让东庄湾这样的村子赶得上城市的收入水平，也很难很快就赶得上永嘉的珠岙村，但我们能让老人在这里可以找到意义，有玩的、有乐的，激发出社区的活力，这是非常重要的。